



26
9.18

烽火

91 32
HUO "9 · 18" FENGHUO



辽宁人民出版社

“九·一八”烽火

(辽宁文史资料)

(总第三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

2A61/25

“九·一八”烽火

Jiu Yi Ba Feng huo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东煤沈阳测试研究中心印刷厂排版 沈阳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字数:210,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25

印数:1—4,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连凯

版式设计:文 思

封面设计:陈日泉

责任校对:李守勤

ISBN 7-205-01984-2 / K·213

登记号:(辽)第1号 定价:4.10元

前 言

6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大好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在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秋的关键时刻，热血的爱国志士们，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同仇御侮，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全辑以翔实可信的三亲史料为主，记述了东北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义勇军的成立、组织、发展、斗争情况。文章中既有义勇军举战旗，抗敌顽、转战白山黑水之间的叙述，也有对仁人志士投笔众戎、毁家纾难感人情景的再现；既可了解当年民众揭竿而起、沓至纷纭的悲壮场面，也可知晓抗日义勇军战斗历程的艰难。虽然波澜壮阔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活动最终遭到了挫折和失败，但其不朽功绩将永载史册。

此书编辑过程中，尽管我们力求使该辑内容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但因征集和编辑的能力所限，所以不尽人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只求在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及其所领导的义勇军歌颂、缅怀的同时，使读者从中感受到：“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将是我们的最大的满足和心愿。

编者

1991年5月

目 录

前 言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始末…………… 邵宇春 王驹(1)

艰难的岁月

——记辽宁抗日义勇军…………… 王振中(25)

激愤的群情…………… 卢广绩(28)

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抚顺地区的斗争…………… 曹文奇(33)

辽宁民众自卫军始末补遗…………… 高华昌(49)

战斗的历程

——回顾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 郭景珊(65)

血沃北疆

——忆辽宁民众自卫军在东边道…………… 赵殿礼(78)

朝阳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运动…………… 秦奎一 董济民(86)

东北第一路抗日义勇军…………… 赵洪刚 曹玉海(101)

第十二路抗日义勇军在北镇…………… 肖广谱(108)

难忘的回顾

——记参加四十八路抗日义勇军…………… 刘品三(112)

第五十六路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活动…………… 张醒 汪世和(119)

庄河土城子战斗…………… 毓棠集 王宝仁(132)

抗日夙志 始终不渝

——记郑桂林部抗日斗争事迹…………… 梅兰亭(135)

浩然正气

——记李春润在辽东的抗日斗争…………… 席 亭(145)

白山黑水忆忠魂

——记邓铁梅抗日事迹…………… 邓卓然(160)

用牺牲兑换希望

——记抗日民族英雄苗可秀…………… 李其昌(175)

义勇忠烈

——记高鹏振的抗日活动…………… 王荣升等(184)

舍生只为救国

——记抗日志士白子峰…………… 刘惠民(197)

抗日英雄曹国士…………… 汪世和(203)

忆刘同先的抗日活动…………… 王佳斌(215)

抗日英烈左子元…………… 姜继先(219)

曾在故土抗日的游子

——记积极抗日的邵焕玉…………… 高庆仁(223)

李海峰和他领导的抗日义勇军…………… 王瑞林 刘树桐(227)

大连抗日放火团…………… 易全金(234)

中国空军之魂

——记抗日爱国将领高志航…………… 刘振永(246)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始末

邵宇春 王驹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简称救国会),是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成立的。1933年8月,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强行解散。在此期间,该会争取和团结了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募集了大量的抗日军械物资,组建、指导、支援了几十万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救国会成立的背景及经过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力侵略东北的战争,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数日之间,辽吉两省大部分领土不复我有。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东北地区上升为主要矛盾。

9月25日,原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王化一,于北平联络了东北各界人士和东北学生,在奉天会馆召开大会。大会决定成立“旅平同乡反日救国会”,选举王化一为会长,并发出通电请求政府出兵东北收复失地。当年参加大会的夏尚志回忆说:开会那天“到了很多人,王化一报告日本侵占北大营情况,约1小时,会场上人们情绪非常激动”。

9月25日晚,王化一邀请流亡北平的原辽宁省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阎宝航、原辽宁省工商会副会长、东北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卢广绩及高崇民、陈先舟等人议事。王化一向他们传达了张学良23日在协和医院的谈话。张学良在这次谈话中说:已向南京方面请示,命令关外不准抵抗,

静候交涉。他们商定，政府暂不出兵抗日，人民应当组织起来抗日。决定把上述三个抗日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第二天，他们分头到各界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中去串联，得到他们的积极支持。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东院的哈尔滨大戏院召开成立大会。大会由卢广绩主持，参加者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东北籍学生。大会通过如下事项：

1. 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

2. 入会条件：不限东北籍人员，凡有国家观念，有国家理想者，为进行以武力抵抗日军之人员，皆可入会。

3. 大会决定：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计划实施发动东北民团、散兵、绿林武装组成抗日游击力量；组织设计委员会，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人才，计划外交方面事宜及应付东北目前状态；训练学生，一部分成为学生军，一部分回东北作政治、军事工作。

4. 大会选出27名委员。他们是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彭小秋、霍维周、熊飞、车向忱、金恩祺、杜重远、黄显声、梅佛光、黄剑秋、钱公莱、王捷侠、杨大光、韩立如、郑奠邦、谷秀岩、李梦兴、孙一民、韦梦聆、陈先舟、林跃山、王卓然、卡宗孟、顾翌棠。

5. 大会通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宣言》。

6. 大会决定把奉天会馆东西两院作为救国会办公地点。

10月21日，救国会在奉天会馆举行全委会议，选出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兴等9人为常委，并成立三个组，各组正副组长由常委兼任。

1. 总务组：由卢广绩、高崇民任正副组长，负责筹划捐款，分配救济物资和前方军需。

2. 宣传组：由阎宝航、杜重远任正副组长，负责对出关人

员的政治培训和抗日宣传等工作。

3. 军事组：由王化一、彭小秋任正副组长，负责组织义勇军，指导义勇军的武装抗日斗争。

各委员分别参加以上各组的工作。

随着各项抗日工作的迅速开展，上述机构和人员已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1932年1月12日，常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了会务改组问题。至25日，救国会机构改组完成。即将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由原来的27名委员，增加到“执委41人，常委15人，监委5人。将原设的总务、宣传、军事3个组，改设为一处两部，扩大了工作范围，增加了工作人员。

救国会是由不同阶级、阶层和不同党派人士组成的。其成员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情况：

一是东北军政当局中力主抗日的高中级官员。如黄显声、熊飞、彭小秋等。

二是辽宁各法团和反日团体的领导人，这些人当时既同张学良有着较深的关系，又是社会名望较高的民主人士，如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车向忱等。他们不仅在事变前就多次领导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斗争，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已与共产党的组织发生了联系，其中如阎宝航早在1927年就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王化一为营救被捕入狱的中共党人尽了极大的努力。

三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及其影响下的广大青年学生，占该会成员的大多数。他们虽然不掌握什么实权，但是各项具体工作几乎全部由他们去做。

四是国民党、国民党改组派，青年党也都有人参加该会，不过他们不掌握实权、多数人又不愿做实际工作，更不愿冒险出关抗日，且意见不一，如梅佛光、曹德宣、钱公秉力图把救国会变为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工具，而青年党人霍维周、王捷侠等人则坚决反对，主张抗日。

救国会在关内的主要活动

救国会甫经成立，即在关外、关内同时开展抗日工作。在关内他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争取各界人士，特别是张学良及东北军政人员的保护和支 持，募集抗日资金，筹办各种军需物资，培养政治、军事干部，救济难民，抚恤抗日烈士遗族，兴办学校等工作。

（一）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处在矛盾中的张学良一面暗中支持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一面是在国民党政府向其追查时，他又向救国会领导人表示：“此后对义勇军的接济问题拟停止，”而实际上并未停止过。张学良的背向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影响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救国会的常委们是十分清楚的。为使张学良冲破蒋介石的羁绊，给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以长期帮助，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式，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对外不抵抗命令，受到国内外舆论的猛烈抨击，当时在上海的吴迈律师愤极赴平，当面将有‘夫差尔忘越王杀尔父乎’的手迹，递交给张学良，以此来刺激张。张见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和吴握手，表示感谢。从这里，可以窥见张学良当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在救国会成立前后，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等人多次向张学良谈到在北平成立群众抗日团休及在东北各地组织群众抗日武装问题，“他不但未加阻拦，还在各方面给以积极配合和照顾。”在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张学良命令北平市公安局局长鲍毓麟“派警察在会场外面警戒，给以保护。”还有一次“救国会组织几千人在北平市内游行，抗议日本侵略东北，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张学良闻讯，立即命令鲍毓麟派出大批警察，沿街警戒，以防日特和汉奸对游行队伍的破坏和捣乱。”当张学良得知日本在平的特务机关企图对救国会进行破坏时，他立即通知救国会人员提高警惕，并送给每个常委一支手枪，用

以防身。不久，还为救国会组成一个 20 多人的警卫班，并发给武器。“救国会负责人外出时，都有警卫人员进行保卫。”以后，张学良还指示北平军分会拨给救国会自来德手枪 94 支，用以自卫。

1932 年 4 月 10 日，张学良在平宴请国际联盟调查团李顿一行，并邀请了救国会多数领导人参加作陪。宴会后，张学良指示王化一赶快整理外交材料，向国联揭露日军侵略东北罪行。12 日，张又指示救国会“不能接受（国联）像法官审问案子那样来看待我们。”4 月 15 日，王化一、苏上达、卢广绩、金哲忱、赵雨时等人在北京饭店以东北地方人民代表身份和李顿等会谈，以大量事实说明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蓄谋已久的计划，是武力灭亡中国的第一步，而不是什么地方性事件。并向调查团介绍了东北各族人民武装抗击日军的详细情况，从而戳穿了日本所谓东北地区已无反对新国家势力的谎言。

由于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使各地群众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得不到当地军警长官的支持，甚至受到制止和迫害。为此，救国会要求张学良在该会派员出关组建抗日武装时能给各地军警下达支持群众抗日的“手谕”，得到张学良的许诺。

救国会为了能使张学良对东北各地群众武装抗日的情况有真正的了解，救国会要求张学良接见赴平的各路义勇将士。张学良先后会见了赵大中、陈勃然、项青山、陈经九、郑桂林、于程九、王显庭、那景春、于百恩、李春润、张一吼、徐柏林、艾中华等几十人，听取他们在吃住无着，械弹两匮情况下英勇杀敌的汇报后，即批现款、枪弹、衣物交由救国会办理。每当张学良受到南京政府压力时，救国会常委们则“坚请支援”。并动员东北军政当局的一部分高级将领向张学良陈述利害。有时救国会还把一些背井离乡的学生，携儿带女形同乞丐的东北难民和为抗日牺牲的烈士遗属代表，引见给张学良。每逢此时，张

都深表同情。过后救国会就请其批发军需物资。1932年10月10日，张学良亲批“拨发军械弹药”着救国会“即日去军委会交涉”，领取。救国会很快就从北平军委会领到一大批军需物资，然后分批从海陆两路运往辽东、热河义勇军驻地。

张学良还调拨出大量现金、粮食、衣物交救国会救济东北学生和难民。

救国会成立之初，活动经费十分困难。张学良得知后通过行辕秘书长王树翰，一次批给救国会14,000元巨款。还给东北各地义勇军赴平代表接济费，一次就给辽南义勇军代表3,000元。他还支持救国会发行爱国奖券，并带头认购，而且金额巨大，带动了大批东北军政人员的认购，使救国会的活动经费有了固定来源。

总而言之，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迅速开展与扩大，是与张学良的暗中保护和支持分不开的。

（二）宣传抗日活动

1. 发宣言函电。救国会成立时即发表宣言指出：“日人占据辽吉后，则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使东北省独立，然后进而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倘此时而我国仍“泄泄沓沓，听其宰割，堕军实，则全国覆亡之祸，即在眉睫。”

10月4日，救国会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政府发出通电，反对伪沈阳地方维持会成立。

10月6日，救国会就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引狼入室投靠日军的叛逆行径，发出函电，警告他立即“勒马悬崖”，取消吉林伪省署，否则“勿谓博浪无锥，荆轲无剑也”。

10月20日，救国会为汉奸赵欣伯充任伪沈阳市长事，电请南京政府“即日明令通缉，就地枪决，以除后患，而戒其余”。

此后在10月26日，11月18日，12月23日，25日，1932年1月5日，二月中旬，救国会又分别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和政

府发出函电，敦促其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声讨伪国，缉拿汉奸。上述函电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国内外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2. 赴沪宁请愿。1931年10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在上海举行宁粤和平会议。救国会决定组织群众赴沪宁请愿，以期唤起民众，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是日，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东北逃难至平的各大学学生和在内的东北民众团体联合组成“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并推举冯庸为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卢广绩、苏上达、李梦兴、高崇民、王宪文、苗可秀、林炜忱、杨治平、阎宝航等9人为指挥，很快组成了620人的请愿队伍。

11月5日，请愿队伍齐集北平车站，车站因奉命不予挂车，队员们纷纷走进车厢向乘客宣传请愿目的，广大乘客为之感动，纷纷下车，请愿团得以乘车南下。车抵天津时“张学铭市长、社会局长等到车站欢送，并派人送来大批食品，沿途各大站均有群众赠送点心，并致意表示同情”。7日晨抵南京，在车站高唱雪耻救国歌，并张贴标语。是日晚抵沪，散发请愿团宣言。由于蒋汪会谈已结束，蒋已返宁。请愿团决定由王化一带队在南京游行示威，派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去见汪精卫、胡汉民。汪、胡大肆攻击张学良，并极力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辩护，代表们据理驳拆，无结果而散。

10日晚，请愿团抵南京，寄宿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礼堂。翌日晨，请愿团去国府请愿，蒋介石直到下午3时才在中央军官学校会见请愿团。他对请愿团提出的“抗日收复失地”等8项要求的回答是“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接着高崇民大声反问：“自辽吉失陷而后，政府除将此事提交国联而外，并无其他具体办法。而领袖诸公虽集议于上海，亦并无谈及此事者。”“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政府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失地，请主席立予答复，以释群疑。”蒋介石被问得哑

口无言。适此天津请愿团赶到，蒋乘机斥责他们道：“东北丢了，东北人来请愿还可以，天津并未丢失，天津学生来请什么愿？”一位天津学生当即反驳道：“东北是中国土地，我们是中国人，你是中央政府最高负责人，所以来南京向你请愿。”接着全场喊声雷动，高呼“请中央领导抗日！收复失地！打倒不抵抗政府！”蒋介石马上软了下来，有气无力地说：“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即离开会场。

是日夜10时，请愿团驻地突然被宪兵包围，“说有共产党分子参加在内，散发反动传单，逐一搜查，毫无所获。”宪兵去后，各大队长和队员们交换意见，表示对中央完全失望，留此无益，决定明日北返自己干。

3. 组织报告会、宣传队、联谊会和“亡省日纪念会”

救国会成立后，先后派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徐靖远等人到平津各大、中学校做报告，讲述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义勇军抗日情况，激励学生们做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他们还在东北籍的学生中挑选一些人组成宣传队，自编自演一些形式新颖，寓意深刻的短小话剧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演出。部分执委和常委们经常与一些东北军官兵举行“聚餐会”，商讨抗日斗争的办法，鼓励他们到义勇军中去工作，争取他们在军械物资上给以援助。执委和常委们还经常到东北军驻地与下级军官士兵举行联谊会，开展思亲人不忘收复东北的活动。每月18日，在平的东北各界人士都到救国会院内举行“亡省纪念会”发表专题演讲，或共诉日军暴行。东北籍学生则分散在各校举行纪念活动。

4. 创办抗日刊物

救国会成立后不久，常委会上决定创办抗日刊物，1932年2月出版了《救国旬刊》。救国会责成李全林为该刊物主编兼总发行。由霍维周执笔的发刊词中阐明了办刊宗旨是“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

团结抗日分子。我全国同志，应举全力集于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共发伟论，以达抗日最后目的”。

是年9月，救国会又创办了王卓然主编的《复巢》报和《东北通讯》。上述刊物用大量篇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种种暴行，报导了东北各地义勇军英勇杀敌的战绩，刊登了国内外各社会团体和个人对义勇军物资支援情况，国内外对东北事件的评述；阐述了救国会的抗日主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勾结日本侵略者进行卖国的罪行。

救国会的上述工作，向全国人民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卖国行为，动员了国内各阶层人士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声援和支持。

（三）募集抗日资金和军械物资

1. 争取国内外人士的援助

救国会除从张学良处得到一定数量的现金和军械物资援助外，还积极争取国内外爱国人士的捐助。

该会成立后，立即派杜重远等人常驻上海，加强对工商各界及海外华侨的联系。救国会还先后派出王化一、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车向忱等人前往南京、苏州、杭州等地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和国民党军政人员，请其援助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孙夫人（宋庆龄）曾允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款。”（宋庆龄后来募得一批巨款，但被国民党扣留）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人在宁沪苏杭等地发起募捐活动，“文化团体、学校师生、律师、职员，甚至出家僧侣都踊跃捐献财物，支持东北义勇军。”当时天津《大公报》的胡政之、王芸生曾在该报登载募捐启示，要求各界人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义勇军抗日斗争。广东省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女士，毁家纾难，一次捐出25000元。报社将读者捐献给东北义勇军的款项逐一交给救国会，由阎宝航统筹支配。

日本对东北的侵占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一部分爱国

将领不顾蒋介石的禁令给救国会以援助。当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李济深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深表同情，在他的暗中协助下，救国会“从陈铭枢处领取了大量炸弹。”许克诚、蒋克鼎、蔡延楷“皆慷慨捐。”“蔡（延楷）每月助5000元，并拨发子弹，希望永久合作。”十九路军在他的影响下，为“赞助义勇军起见，复决定按月节衣缩食，补助六千余金，义声所播，一时各个公务人员，闻风感奋，竟起仿行。”“即穷乡僻壤之间，凡属有心人士，对于义勇军之艰苦抗日，以莫不竟致援助。”迫于全国抗日的呼声，蒋介石也不得不派其秘书高凌百交给救国会一张30,000元的支票来表示其对抗日的支持。

2. 发行“爱国奖券”

1932年5月11日，王卓然、宁恩承、韦梦令倡议发行“爱国奖券”来筹集抗日活动经费。这一倡议得到张学良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支持。6月24日，救国会召开“爱国奖券”会议，制定了具体发行办法：即当众开奖；奖券全张面额1元，每张分5条；每条2毛；每月10日开奖一次。张学良每次都带头认购很多奖券，平津卫戍司令部及河北官产总处，亦每月认购。这样一来，东北军政人员、各界人士、甚至小贩、农夫也争相购买，宁沪各界人士也纷纷汇款认购。是年8月10日，由韦梦令主持第一期开奖。12月25日，又举行“爱国奖券特奖开奖。”“直到被南京政府强令停售，爱国奖券事务所宣告结束，总共发售爱国奖券六期，特种奖券一期，净余款17万元，对支援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3. “义卖”活动

“义卖”也是救国会募集抗日资金的一种方法。救国会 will 各界群众捐赠的大量生活用品，一部分发给义勇军战士，余下极少一部分则在平津城乡“义卖”。据当年曾参加“义卖”活动的纪亭榭同志回忆：衣服一件3元、鞋2元一双，毛巾1元一条，肥皂1元一块。虽然价格极贵，但群众仍争相购买。绝大多数群

众“买”了一条毛巾或肥皂，却给几块大洋，然后又把“买”来的东西放回原处。我们先后“卖”了几次，就得了3万多元，可是东西并没有“卖出”多少。

救国会通过上述方法筹集了大批现金和军械粮秣，不仅推动了救国会在关内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而且给予了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将士在精神和物资上以极大的援助。

（四）培训军政及无线电收发报人员

为了提高抗日义勇军的军事、政治素质和加强通讯联络，救国会先后从东北籍学生中挑选出一批学员，分别给以短期的军事、政治及无线电收发报技术的训练，然后分派到东北各部义勇军中去工作。

1. 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

1931年11月，救国会把住在江西会馆的东北大学学生，组成“东北抗日学生救国军”责成张希尧、张金辉、苗可秀、宋黎负责。初期只有几十个学员，很快就增加到二三百人，遂由江西会馆迁到西山卧佛寺。他们的生活条件虽然十分艰苦，吃粗粮，睡地板。但他们的抗日热情却分外高涨，每日早起跑步、出军事操，白天上国术课，学习射击，投弹，肉搏技术，兼学制作炸弹的方法和爆破技术。教员都是平薪聘请的，有的更是不要分文。此外，救国会派一些负责人和邀请社会名流到学生军做政治时事报告，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在此期间，学生军还经常组织宣传队走上街头、学校，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学生军原计划培训三个月，实际上训练不久，一部分学员就被派往东北各地从事抗日工作，以后又有一部分被派到救国会工作。余下少数年龄较小的送入学校继续学习。

2. 政治训练班

为了给义勇军培训专门政治工作人员，由救国会开办的“政治训练班”于1932年2月24日，在奉天会馆内正式开学。该班由阎宝航负责，学员都是从东北籍青年中挑选的。授课内